

我是在1993年9月从我国驻厄瓜多尔大使的岗位上被调去哈瓦那担任我国第10位驻古巴大使职务的。在我得到即将去古巴工作的消息时,我曾经兴奋不已,因为那将意味着我会有机会同卡斯特罗主席见面、交谈。不过,由于卡斯特罗主席从不出面接受外国大使递交的国书,我又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求他马上单独接见我,所以我到任后一个多月都未能同他进行过即便是很短暂的交谈。直到当年的10月底,我才找到机会同他见面。

我与卡斯特罗主席见面的机会多了,谈话的话题自然就多、而且很广泛。同卡斯特罗主席谈话是人生的荣幸和乐趣,他的快言直语、广博知识、缜密逻辑、语言幽默和平易态度会让你终身难忘。

我记得,1993年末的一天晚上,我曾与卡斯特罗主席一起谈论过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址等问题,双方谈得非常投机,许多观点也很一致。那次谈话的时间虽然距今已经过去十多年,但谈话的情景和内容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一是每次卡斯特罗主席与我的谈话都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二是我在厄瓜多尔期间受国内委托做过与奥运有关的工作,记忆尚深,在相对短的时间里与不同的人谈论同一个题目往往让人容易记得住;三是我本人喜爱体育运动,对奥运的事情经常关注,尤其是我自己直接参与过的重要事项。

那次与卡斯特罗主席谈奥运,我是从古巴的体育事业谈起的。实际上,我与他谈奥运是有备而来,主要是想通过这一话题,听听他的评论和意见。我在赴古之前,曾经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从当年的3月开始连续为我国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在厄瓜多尔的几个城市之间奔波,先后向厄瓜多尔政府的有关负责人,包括教育部长和奥委会主席,还有当时的厄籍国际奥委会委员阿罗约等人做工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直到9月我奉调离开基多。尽管经过我和使馆同志们的不懈努力,厄方对北京申办奥运的态度很为积极,但我国的那次努力却未能成功。我是在抵达哈

真诚与信任

周铁钧



在机关工作的人都有这样体会：同事可以一起开会、出差，但很少串门；可以一起闲聊、调侃，却很少谈心。人和人之间似乎缺少一种真诚和信任。

曾读到一个故事：某大学餐厅的门经常被踢破，管理员为此伤透了脑筋。门又一次被踢破的这天，他来找校长：这帮小青年控制不住，我看干脆换成铁门！校长笑了笑：放心，我已订做了最坚固的门。

没几天，旧门拆下，新门装上。果真，它居然没过挨一次踢，学生们走到门口，总是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纵然是双手都端着东西，也要用身体慢慢移开它……这是一道玻璃门。

这道门怎能不结实，它用真诚捧出一份足够的信任，把一个易碎的美丽大胆的交到孩子手中，让他们在被信任中学会珍惜和呵护。

卡耐基曾说：“得到别人信任的最好方法就是：真诚地信任他。”1948年，在英国的议会大厅举办庆祝“二战”胜利演讲会，会场聚集了英国军界、政界要员和参、众两院的议员，首相丘吉尔上台演讲，他用手势止住大家的掌声，说：“我们取得成功的因素有三个，第一是，你们真诚的信任我。第二是，我真诚的信任你们。第三是，我们时刻用真诚相互信任！”

说完他走下讲台。会场静寂了一会儿，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在杰出政治家心目中，成功的秘诀竟如此简单，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导致群体性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真诚、互不信任！

瓦那后得知中国申办失败的消息的，很想能和卡斯特罗主席谈谈这件事，就刻意准备了有关奥运的话题，还在约定好的日期前两天特意让人带我去首都哈瓦那专门为泛美运动会建设的馆所转了一圈。

卡斯特罗主席也是个体育迷，年轻时不仅是大学篮球校队的主力前锋队员，还是个挺有水平的棒球击球手。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职务后，仍然经常做些强身健体的运动，还时不时地到各类国家体育团队去走走、看看，甚至动手。可以说，谈起体育来，他是样样精通，津津乐道。他到高龄时仍然精力充沛，应该与他年轻时喜爱体育运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听我赞扬古巴的体育发展，卡斯特罗主席马上接过话题，称赞中国已从“病夫”成为了“雄狮”。紧接着，他主动对我说，国际奥委会不把2000年的奥运会放在中国去办应该是个失误，但中国是个体育大国、人口大国，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机会成功举办一届世界人民翘首期盼的奥运会。我们古巴也总有一天会去申办奥运会，因为古巴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权利。在讲这些话的过程中，他还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有关各国的态度和情况，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我认真地听着，不时地提出一些我不很熟悉的问题。

卡斯特罗主席的话让我大喜过望。首先，我没有费多大周折，就听到了我想听到的评论，而且比我预期的还要多、还要全面；其次，北京第一次申办失利的消息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但留在我心头的阴影总未能完全驱去。他的话帮我平息了久存的障漶；再者，他的高瞻远瞩极大地鼓舞了我，使我对我国以后的申办成功更加充满了信心。如今，卡斯特罗主席的预测成为了现实，我国终于取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权。我想卡斯特罗主席也一定为之高兴。

（本文作者曾先后任中国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大使）

编者按：本报今起开辟《中国大使札记》，邀请中国驻外大使谈他们在异国的所见所闻，为读者打开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敬请留意。

在抗日战争期间,肖华与高树勋在冀鲁边区可以说是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肖华是共产党的部队“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简称“挺纵”)的司令,那时年仅二十多岁,高树勋是国民党部队石友三部十军团第一军的军长,年长肖华十多岁。两人所率领的部队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曾一度合作抗日,但两支部队的素质却差别很大。肖华的部队军纪严明,战斗力强,与边区人民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关系,所创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深受人民爱戴。而高树勋的部队虽然武器装备好,但战斗力却未必与之相称,且部队人员中不乏吸毒、嫖娼者。所以当年在冀鲁边区民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五团打(指肖华部队),六团转,十军团吃白面。”

由于十军团在其内部的某些反共分子的挑唆下,不顾抗日大义,经常与我共产党的部队闹摩擦,挑衅滋事,争夺地盘,甚至杀害共产党政权的干部。1938年某月,当时我所在的宁津三区就有几名下乡工作的民主政府干部遇害。此事激起了区长崔益民的极大义愤,拟率部与之拼打,为遇害的干部报仇雪恨。当时的形势可说



不动,犯了游击战的大忌。这一情况被日伪军侦知后,调集了数十个据点的部队,分路合击,将高树勋部团团围住,高树勋率部数次拼死突围,但均未成功。于是高树勋向驻守德平等地的国民党部队求救,但对方为了保存实力,装聋作哑,不发一兵一卒。万般无奈之下,高树勋向肖华求救。在十军团生死存亡的关头,肖华率部连夜急行军数十里,赶赴宁家寨,乘夜向日伪军发动攻击,打开了日伪军的包围圈,与被围的高树勋部内外夹击,终于使敌军溃散而去,解救了高树勋和十军团。高树勋为此深受感动,敬佩共产党部队的深明大义。以后在解放战争中,他率部起义,投入人民怀抱。他本人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

不仅如此,为了抗日大义,肖华司令员还以德报怨,在危急关头率部拯救了十军团。那时十军团自恃武器装备好,屯兵宁家寨三个月

适之,此人被奸相李林甫排挤迫害而死。李适之罢相后,曾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日费万钱”,豪饮如长鲸吸川,以抑心中不平。这也是杜甫欣赏的人,诗中有赞赏,也有哀叹。第四位崔宗之,现代人不熟悉他,杜甫只用三句诗,便生动勾画出一个正直而潇洒的人物形象:举杯向天,白眼阅世,玉树临风。第五位苏晋,是当时的一个才子,能著妙文,也长斋拜佛,但此公却常常破戒饮酒,我行我素,不为佛法所囿。其逃禅偷饮,显露出真诚可爱的性格。

第六位酒仙便是李白,写李白的四句,可谓脍炙人口,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太白的文字画像。杜甫诗中,对李白的酒事如数家珍。李白诗文名动京城,唐玄宗曾封他为翰林,是一个闲职。心气高傲的李白为之郁闷,常常独自到长安的酒肆中饮酒解闷,很多佳作是在酒后一挥而就。据说唐玄宗和杨贵妃有一天在观赏牡丹时,突然想到让李白来为牡丹作诗。太监高力士找到李白时,他正在街头酒肆喝得酩酊大醉,已经无法上船入宫。高力士不由分说,扶着李白来到宫中。唐玄宗见李白带醉来见,颇不悦,认为他醉成这样,不可能写诗。李白却自称酒中仙,能酒后作诗。唐玄宗以为李白是说醉话,但还是让高力士给李白斟了酒。李



白连饮三杯之后,不假思索,写出三首《清平调》,成为千古绝唱。其中有“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样的妙句。

醉后之作,竟然成为不朽诗篇,在人类的文学史中大概也是绝无仅有。这是诗仙李白创造的奇迹。

《饮中八仙歌》中写到的第七位酒仙,是草书大师张旭,张旭带醉书写狂草,在史书中有记载:“吴郡张旭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写,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甫在诗中展现了张旭酒后挥笔的景象。最后一位焦遂,今人也陌生。传说焦遂口吃,平时结巴得说不成一句话,醉后却高谈阔论,妙语如珠,使闻者叹服。

杜甫写《饮中八仙歌》,其实并非赞酒,而是叹才。才人志士,醉态可掬,身醉而心神不醉,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下的滚的滚,爬的爬……

大概经过一小时的谈话,我们了解了这些材料后,和他们告别。当我们回到团政治处的时候,主任已给我们准备好骑兵,要把稿子连夜送到纵政报社去印。上级这样的照顾,更使我们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我们坐在地下,用麦草盖着脚,开始写鼓词、歌子和快板。瞌睡像传染病似的渐渐厉害起来,起先还可支持,越往后眼皮越重,我们用冷水沾在头皮上,于是又清醒过来,又继续写了下去。这样,终于完成了任务。当我们躺在铺上时,敌机已经开始又一天的轰炸了。

明日请看《我来到英雄一连》。